

新疆文史



第二辑

1984年10月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史研究馆

BB71\24

8.16.6
28
2

《新疆文史》

第二辑 目 录

一、审时度势识大体，军心民愿举义旗

纪念新疆“九·二五”和平起义三十五周年……………陈方伯（1）

二、民族团结的典范

记阿巴索夫烈士事迹片断……………柴恒森（7）

三、忆我和阿巴索夫相处的日子里

……………崔景福（9）

四、徐学功二三事

……………金国珍（11）

五、国民党时期新疆田粮处派系斗争见闻

……………欧阳文麟（13）

六、诗词十八首

……………欧阳克巍（15）

附钟英同志读欧阳克巍《诗词十八首》后给克巍同志的一封信及试和克巍老

师《六七自寿》诗一首。

七、胡宗南见闻录之一

……………欧阳文麟（18）

八、为和平民主 碧血写千秋

追忆李公朴同志二三事……………潘天青（27）



B 089998

审时度势识大体，军心民愿举义旗

纪念新疆“九·二五”和平起义三十五周年

陈方伯

(一)

淮海大捷，使国民党所谓精锐之师，损失殆尽。一九四九年，我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大西北进军，解放了广大地区，乘胜向新疆挺进。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面前，以陶峙岳将军为首的国民党驻新疆部队，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宣布和平起义，接着于二十六日以包尔汉主席为首的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宣布起义、声明与国民党广州反动政府脱离一切关系，归向以毛主席为首的人民民主阵营，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从而化干戈为玉帛，和平解放了新疆。这一正义行动，是顺应新疆各族人民和国民党十万官兵及其家属的心愿，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受到新疆各族人民及广大官兵的热烈拥护和欢迎，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复电嘉奖。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新疆和平解放已经三十五年了。在纪念新疆“九·二五”和平起义三十五周年的时候，也正值我们伟大祖国建国三十五周年大庆的前夕，双喜临门，普天同庆。回顾过去，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展望未来，豪情满怀，前程似锦。

三十五年前，我能审时度势，顺应时代的潮流，弃暗投明，积极主张并以实际行动参加起义活动，为和平解放新疆做了绵薄贡献，虽然原因很多，但是，主要是受了中国共产党对敌伪军政人员政策的感召，相信了党的政策。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颁布的八项基本政策，以及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毛主席在《南京政府向何处去》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时至今日，一切空话不必多说了，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藉以立功自赎为好”的名言，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教育。

三十年代中期，盛世才统治新疆时，中国共产党派大批干部来新疆工作。其中许多人是优秀的中共党员。这些人中有我的同事和知心好友。他们在新疆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对我影响很大。我开始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党的政策有所了解，对解放区情况、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都有所认识，所以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必然垮台的前夕，我毅然追随陶峙岳将军、包尔汉主席参加了和平起义的壮举。

虽然如此，但在当时复杂情况下，要达到起义的目的，并非轻而易举。反起义势力相当顽固，气焰相当嚣张，应该怎样对付，具体工作怎样做？对我来说，心中无数，感到前途未卜。中共政策虽然明确，但在执行上怎样？心中没底。自己又不是中共党员，而苏联共产

党肃反的那套做法，任何人也不容易过关。而我的中共老朋友，已多年失去联系，能否依靠，已成问题。加上左曙萍（国民党焉耆专员、军校六期毕业、国民党嫡系）等的拉拢、游说，如说什么“走则安，留则危。”“不能坐以待毙”等词令，成为他劝将的文书。并说如能跟随他们去台湾或外国，保证一帆风顺，一切如意。同时在一九四八年底，新疆省政府酝酿改组，新的省政府中能否保留我的厅长职务，尚难预料。由于这种种复杂的因素，所以在去留问题上，我曾一度反复考虑过。但是，当一九四九年元月宣布包尔汉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仍保留我的厅长原职，也就打消了出走的念头，决心留在新疆。

既然留下了，也略知新疆的前途是和平方式解决问题，那么应该怎样做？首先要和起义派紧密联系，加强团结，合衷共济。主席包尔汉、秘书长刘孟纯、迪化市市长屈武等是省政府方面的决策核心人物，是组织起义的领导力量。我和他们紧密联系，在政治上、行动上保持一致。一九四九年四月刘孟纯、屈武从南京回乌鲁木齐，带来了张治中将军的决策。刘孟纯向我介绍国内形势时，明确表示：国民党大势已去，应该认输。新疆的出路，只有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我们应该努力维持新疆政局的稳定，以待时机。

稳定新疆的政局，固然要依靠军队，但是，没有政府方面的合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起义也是枉然。任何方面发生问题，都将出现连锁反应，影响全局，不堪设想。当时省政府在乌鲁木齐的委员中，截然不同分为两派：委员兼主席包尔汉、委员兼秘书长刘孟纯、委员兼迪化市市长屈武、委员兼财政厅副厅长白文显、委员兼建设厅副厅长刘德恩、委员兼教育厅副厅长陈方伯、委员兼社会处处长刘永祥、委员兼社会处副处长尔德尼、委员兼语文学学校副校长钟棣华、委员刘效黎等都拥护起义并积极参加活动，在起义中作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包尔汉、刘孟纯、屈武等则是起义的主要核心领导。与此相反，委员兼民政厅厅长王增善、委员兼财政厅厅长贾尼木汗、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穆罕莫德、伊敏等反对起义。最后王增善、穆罕莫德、伊敏于“九·二五”前夕逃亡国外。贾尼木汗因叛变作乱，受到人民政府镇压，被人民所唾弃。

在酝酿起义中，充分显示了人民的力量。文化教育界表现得较为突出。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最富于革命性，对时局最为敏感。他们绝大多数人盼望早日得到解放，早日推倒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他们不但对中国共产党有所了解，而且还有深厚的感情。这应归功于大批中共党员在新疆辛勤工作的结果。正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疆有广泛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各族人民中，尤其是在各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享有很高威望，所以新疆在宣布和平起义前，纷纷出现许多革命进步组织。如“战斗社”、“先锋社”、“新疆民主同盟”、“民主青年团”等等。这些组织中的各族成员，多数分布在各大、中学校。他们宣传党的政策，稳定学校秩序，促进起义工作，起了积极作用。所以，新疆和平起义的顺利实现，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光辉成果。

（二）

因为教育界比较敏感，广大青年又特别活跃，所以稳定教育界十分重要。我当时认为：对待学校师生的问题，要因势利导，晓之以理，约之以矩，绝不采取强硬手段。一旦发生问题，要协商解决。当时各大、中学校师生中，有许多人是革命进步组织的成员。这就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注意，渗透到各学校的特务，活动频繁。如果对特务的活动，没有一个

充分的估计，就会吃亏上当。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的一天，省立第一中学校长张雅韶来教育厅对我说：“听说各大、中学校的教员代表，将于十二号在‘文化沙龙’开会，讨论向省政府请愿，要求增加薪金。因为纸币毛荒，物价一日数涨，无法维持生活。如果增加薪金不成，将采取向省政府请愿和罢课的行动。”我听了以后认为：假如请愿、罢课成为事实，那将是平静的水面，投一块巨石，掀起险恶的波澜，使无事的乌鲁木齐，发生事端，后果不堪设想。我经过考虑后，决定十二号亲到“文化沙龙”参加会议，弄清真象，并借机向各校代表表明教育厅对待薪金问题的态度，声明愿与大家合作，求得合理解决。

当我于十二号上午只身一人，徒步到“文化沙龙”时，会议尚未开始。与会者见我突然出现，感到意外，甚为惊异。在我说明来意后，要求大家有问题尽量提出，一定能求得合情合理的解决。我声明绝不把正当要求，看做是别有用心地举动，更不采取压制的手段。我身为教育厅厅长，说话算数。我说完以后，与会代表反而未提任何难以解决的问题，甚至连过头话也没有说。所提的问题，当场都做了肯定答复，得到解决。然而就在会后第二天夜里，城防警备司令陈德法和警察局长刘汉东二人来到教育厅见我，向我说：“奉上级命令，请你马上把各学校带头闹事的教员名单列出来，立即进行逮捕。不然，各大、中学校教职员将于天明后在广场集合，然后到省政府请愿，要求增加薪金。如达不到目的，即宣布罢课。所以我们要先发制人，采取行动。”我向他们解释说：“这不可能，绝无此事！纯系谣言。因为我昨天参加了各学校教员代表在“文化沙龙”举行的会议。他们要求增加薪金问题，我做了合理的答复，与会者表示满意，问题已告解决。会场气氛平静，毫无请愿、罢课的迹象。如在没有确实证据的情况下，无理逮捕，那将是庸人自扰，官逼民反，激起事端。万不可轻举妄动，无故捕人。假如天明真有请愿、罢课的事件发生，我负完全责任。”在我坚持下，并且向刘孟纯秘书长做了请示报告，征得同意后，陈、刘二人只好快快离去。

陈、刘二人走后，我为了求得稳妥，弄清真象，保证不发生事故，马上召集省一中校长张雅韶、省一师校长丁克昌、省一女中教务主任樊质斌、省女一师校长禄延寿、省二中校长楼楚江等开会，讨论是否有请愿、罢课的可能？与会者一致认为：纯系造谣诬陷，是特务分子阴谋破坏起义的诡计，是反革命顽固派灭亡前垂死挣扎的必然表现。我为了进一步摸清底细，会后又单独约来一中教师刘鸣凤谈话。因为刘在当时表现积极进步，被认为是教员中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刘表示：绝无此事。随后我把整个经过，向刘秘书长又作了汇报。一场无端的风波，遂告平息，险未酿成大祸。

由于不安因素日渐增长，常常无风波起。我为了进一步掌握学校，达到稳定学校的目的，对个别中等学校校长作了调整。省一中校长张雅韶于七月初参加了“新疆各界致敬团”，去兰州向新任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致敬。张在临行前向我表示，去兰州后不再回新疆。我就委派教育厅主任秘书李玉祥接任校长。调省一师校长丁克昌接任教育厅主任秘书职务。派文斐然接任一师校长。前此，省女师校长已派教育厅主任秘书禄延泰接充。女中实际上是教务主任樊质斌负责。以上这几位主要学校的负责人，都能和教育厅保持一致，都是起义派。正因为采取以上措施，尽管在新疆和平起义前的一段时间里，乌鲁木齐呈现出人心惶惶，动荡不安，反对起义的顽固派企图利用学生惹起事端，制造混乱，但各学校始终未发任何事件。这就大大有利于和平起义的顺利实现。

(三)

一九四九年七月间，玛纳斯、呼图壁、昌吉三县纷纷传说三区方面要向乌鲁木齐进攻，驻军已征集民间大车一百五十多辆，以备撤退时作为运输工具。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这是一个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对和平起义不利。省政府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从速与三区方面联系，弄清真象，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包主席和刘秘书长经过研究决定，由省政府派代表团去玛纳斯主动与三区方面进行正式谈判，求得相互谅解，共同维护和平局面。

八月八日上午九时许，省政府办公室打来电话，叫我马上到主席办公室，包主席有要事相商。我到主席办公室后，见刘孟纯秘书长已在座。包主席对我说：“近日来，绥、呼、昌三县盛传三区方面要进攻迪化，民心不安。为了弄清情况，免生事端，省府决定派你和秘书处人事室主任努斯来提、省保安司令部王科长三人代表省政府去绥来与三区方面进行会晤。洽谈维持新疆和平，双方都不挑起事端。代表团由你负责。明天就去。”说着努、王二人到来，他俩已被告知去玛纳斯的任务。刘秘书长接着说：“你们先到七十八师师部，去见师长叶成，我有亲笔信给他。请他通知绥驻军二二七旅旅长朱鸣刚，教朱旅长协助你们做好过河与三区方面会晤的一切准备工作。包主席有信给绥来县副县长吾守尔阿吉（哈族），教他立刻进山，向牧民宣布：省府已派代表团去河西与三区方面进行谈判，仗是打不起来的。大家要各安生业，切不可惊慌，不要逃离家乡。”刘秘书长接着说：“陈厅长做过绥来县长，了解那边情况，军、地两方面人士都很熟识，工作比较容易。”最后他说：“《新疆日报》记者龚觉民随你们同去采访，说他是你们的随员，便于行动。”

八月九日，我们乘坐一辆大卡车，上午九时出发，十一点多钟就到了呼图壁七十八师师部。我们见了叶师长，首先交出刘秘书长给他的信。因刘兼任西北行辕秘书长，所以叶对刘很客气。当我向叶说明去玛纳斯与三区方面谈判，表明我方绝无向河西进攻的意图时，叶表示赞成省府的決定。他说：“我们毫不含糊的可以击败他们。我们已经不是四年前的情况了。他们不要错估了形势。”说着他就给玛纳斯驻军二二七旅旅长朱鸣刚打电话，教他妥善安排，并与三区方面联系，作好协助我们过河的一切准备。因为我和叶是老相识，所以留我们在师部共进午餐。在交谈中，当谈到解放战争进展神速，国民党军队就要全面崩溃，新疆处境十分困难时。叶非常气愤地说：“无能！无能！”随即声泪俱下，泣不成声。大呼“完了！完了！”充分暴露出外强中乾的本质。

代表团离开呼图壁，下午三点多钟到达玛纳斯。在县政府休息片刻，就去旅部和朱旅长会面。因已接到叶师长的电话，所以朱一见面就直接了当地说：“你们说怎么办？我一切从命。”我拿出给河西三区方面的信，教他马上派人送过河西。信中提出约定会晤地点，并告知以陈方伯为首的代表人数、姓名、职务等等。当晚得到答复，决定十日上午十时会晤，地点在河西岸临时搭的席棚内。因为沿河两岸都驻重兵，筑有工事，所以附近的房屋早被拆除。当时正值河水汛期期间，大桥又在一九四五年战争时被炸毁，由于水深流急，汽车不能通行，只好改乘马车。过河后，我们被引至席棚前。三区代表已在棚前迎候。棚内布置简单，只有长桌一张，桌上摆有茶点。三区方面参加谈判的有：代表团团长、民族军副司令员马尔果夫，团员有驻军团长伊敏诺夫和努古索夫二人。双方互致简短问候和自我介绍后，我

首先发言。我说：“据传你方有发动军事进攻的迹象，因而绥、呼、昌三县人民惶惶不安，纷纷作逃难准备。为了应付事变，绥来县政府徵集民间马车一百五十多辆，备作运输之用。大忙季节，影响农民生产。为了人民的利益，代表们受省政府的委托，代表包尔汉主席和陶峙岳总司令向你方保证不动用武力。严格要求沿河驻军，不准无故寻衅。同时希望你方也采取同样行动。”接着马尔果夫发言，他声明，三区进攻乌鲁木齐，纯系河东谣言。他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并提出：“第一，我方保证不发动武装进攻，你们可向省政府和人民转达，教人民各安生业，不要惊慌外逃；第二，把军队徵集的民间大车等运输工具，立即全部发还人民；第三，在我方士兵下河饮马或取水时，你方士兵不能挑衅，更不能开枪伤人。”我们对马尔果夫的三点意见表示同意，遂达成口头协议。双方谈话，由我方代表努斯来提担任翻译。

我们返回玛纳斯县政府后，马上召集县长史秉直、县党部书记长俞烈以及警察局局长和区、村镇长开会，传达会谈结果。并责令他们立即召集城关人民在县政府开会，在群众大会上，我宣布了谈判结果，同时发还了徵集的马车。在返回乌鲁木齐的途中，在呼图壁、昌吉两县，也召集了同样宣传解释的会议。一场由国民党特务煽惑的混乱和风波遂息。

(四)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疆的形势也跟着急剧变化。兰州解放，解放大军浩浩荡荡向河西挺进，迫近新疆。经过起义与反起义力量的较量，迫使反起义顽固派的一切阴谋，终成泡影，均未得逞。在陶峙岳将军坚强、缜密、稳妥领导下，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人终于交出兵权，隻身携眷外逃。陶峙岳抓紧时机，遂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率领国民党驻新疆部队宣布起义。新疆省政府于二十六日上午召开省府委员临时紧急会议，讨论起义问题。这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一清早就接到省府办公室的电话，通知八点钟（新疆时间）在省府会议室召开临时紧急委员会会议。并说：昨天，以陶总司令为首的驻新疆部队已通电起义。我听了以后，压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忙告诉家人提早开饭。不到开会时间，我已到了会议室。真是不约而同，多数委员都已先我到达。个个喜形于色，谈笑生风，谈论的主题是部队起义通电。

不到八点钟，包主席进了会议室。他看人已到齐，就宣布开会。出席会议的委员有：刘孟纯、屈武、白文显（回族）、刘德恩（满族）、陈方伯、刘永祥、尔德尼（蒙古族）、钟棣华（锡伯族）、刘效黎等。包主席简短的说明会议内容以后，提出两项议题。第一，讨论通过新疆省政府起义通电全文。电文宣布从即日起，与国民党广州政府脱离一切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第二，讨论决定：自宣布起义之日起，各党、政机关、学校全体工作人员和各族人民，要切实负责保护一切文卷、档案，保护一切公共财产，维持正常工作，遵守社会秩序。任何人不得以任何藉口，损坏销毁文卷、档案；不得破坏、盗窃公共财产；不得停止工作，擅离职守；不得危害社会秩序，破坏社会治安。

会议气氛非常严肃认真，一反往昔那种高谈阔论的习惯。因为那是一次不寻常的会议，是一次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会议。它结束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新疆的黑暗统治，开辟了新疆历史的新纪元。会议进行的非常顺利，委员们热烈发言，精心讨论，心情都很激动。最后委员们用起立的方式，一致通过了决议。并在通电上签了字。

会议结束后，大家很快离开会场。我匆忙返回教育厅，立即召开省立各大、中学校及省立民教馆、图书馆、文化书店等厅属单位负责人会议，传达新疆省政府委员会的决议。因为军、政当局两个通电起义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全市，乌鲁木齐沸腾了，所以不到下午二点开会的時間，人已到齐，教育厅的会议室，挤得水泄不通。我在会上传达了省政府委员会的两项决议，并作了简短讲话。我着重强调起义给人民带来的利益，是全疆各族人民的莫大幸运。起义的成功，来之不易。要求与会的全体干部，在临时省政府的领导下，坚决贯彻省政府的决议，保护文卷、档案、公物、公产，遵守纪律，作好工作，严防坏人乘机捣乱。用实际行动，迎接人民解放军早日到来。

九月二十七日，起义后的临时省政府，向全疆各级地方政府发出通电，宣布“九、二六”通电的内容，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切实遵照执行。并且要与地方驻军合作，维持社会秩序，进行正常工作。同一天，省政府在行辕前广场召开了庆祝和平解放群众大会。包主席、邓力群等领导同志在会上讲了话。会场秩序井然，群情振奋。欢呼之声，响彻乌鲁木齐上空，盛况空前。

在人民欢庆胜利的同时，于九月二十八日，乌鲁木齐出现少数坏人勾结特务分子和起义部队中的顽固分子，煽动少数不明真象的群众，集聚在东大街，企图闹事，准备抢劫商店和银行，破坏起义后的安定局面。省政府得知这一情况后，一方面命令省保安部队立即出动，维持秩序，驱散人群，宣布戒严。并由军官学校学生担任岗哨。另一方面由社会处处长刘永祥出面，发起组织慰劳起义将士慰问团，进行劳军。由于工作及时，措施得当，幸未发生重大事件，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五团于十月二十日进驻乌鲁木齐，后续部队迅速进驻全疆各地。个别地方的动乱局面，很快被平息下来。十二月十七日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建立了人民政权。古老的新疆，放射出灿烂的光辉。从此人民当家作了主人。

（五）

三十五年来，的经历证明，起义的道路是一条光明路、幸福路。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对起义人员的教育和安置。我深深体会到：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尤其是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力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了各项政策。以我来说，我对新疆的和平起义，本来作了微不足道的工作，贡献很少。但是，党和人民政府却给了我很高的政治荣誉，教我担任自治区五届政协委员和全国六届政协委员，参与国家大事的协商。我现在虽然已经七十五岁了，仍能知情、出力，感到有使不完的劲。真是“满目青山夕照明”，同时家庭美满，儿孙满堂，子女工作都很如意，各得其所。

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一九八三年九月，经中央批准，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组织了“新疆爱国人士学习参观团”，我被推为参观团副团长。参观团一行四十人，都是起义人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参与新疆一九四九年“九、二五”起义的省将级人员。参观团在北京、天津、南京、无锡、苏州、杭州、福州、泉州、厦门、上海、西安等十一个城市及农村参观学习，跨越十四个省区，行程二万七千余里，历时五十八天，收获极大。真是：锦绣河山一览收，欣欣向荣喜心头，老牛不感夕阳短，捐献余热上层楼。

更使我们感到荣幸的是，在北京参观期间，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解放军总

政治部主任余秋里、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杨静仁以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屈武等领导同志的接见。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充满了欢乐的气氛。领导同志和参观团全体成员合影留念，并且进行了亲切交谈。对新疆“九、二五”起义给予很高评价。王震说：“你们对新疆起义是有贡献的，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新疆各族人民更是不会忘记的。”听了中央首长的亲切鼓励，内心非常激动，也充满感激之情。

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正确路线指引下，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在这个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一定为振兴中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发出余热，做出贡献。

编者的话：

《民族团结的典范》、《忆我和阿巴索夫相处的日子里》两篇短文，是柴恒森、崔景富以亲闻目睹写出的阿巴索夫事迹片断。阿巴索夫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的生动事迹非常感人。今年是三区革命四十周年，特发表这两篇短文，期望通过向革命先烈学习，进一步增强民族团结，加速新疆的四化建设。

民族团结的典范

记阿巴索夫烈士事迹片断

柴恒森

阿巴索夫同志早在青年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深刻地懂得民族压迫的阶级根源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正确道路。他在处理民族关系和增强民族团结方面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刽子手盛世才的反动统治激起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一九四四年七、八月间，巩哈（即现在的尼勒克县）人民的武装暴动迅速扩大。盛世才施展反革命惯伎，委派他的亲信刘秉德赴伊犁宣抚，曾在归化族（即俄罗斯族）俱乐部召集群众大会。当时，被指定担任大会翻译的阿巴索夫，在翻译过程中乘机大胆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宣抚阴谋。不料被精通维语的刘秉德发觉，当即将阿巴索夫推开，自己担任翻译。尽管这样，刘秉德的阴谋并未得逞，而阿巴索夫的目的都达到了。因此，人们无不为之大无畏精神所感动，又无不为之安全而忧虑。第二天传说纷纭，有的说阿巴索夫被公安局逮捕了；有的说阿巴索夫逃出境外了等等。

阿巴索夫天资聪明，好学不倦，汉文阅读能力达到高中以上文化水平。他借助这个有利工具，更促进了他与汉族同事的亲密团结，不分畛域。

一九四四年十月中旬，我从盛世才监狱获释后，回伊犁探亲。十一月七日，三区革命军攻入伊宁的第三天，突然有人敲我家的门，并高呼：“柴老师在家吗？”我四妹闻声知是熟

人，立即把门打开，进来的是一位全副武装的英俊青年。我四妹马上介绍说：“这是阿巴索夫先生，我的同事。”又指着我说：“这是我四兄柴恒森，最近才出狱的。”彼此寒暄几句之后，阿巴索夫即正色说：“我们这次武装起义，目的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在起义之初，尽管严禁杀伤一般群众，但群众发动起来了，仍难免有抢劫杀伤群众的事情出现。为了你们的安全，以防万一，请你们全家到我家避避风头。鉴于阿的情真意切，我们全家四口人遂往他家暂住。这时已有他的一位同事姜盈喜先住进他家。第二天，他又把另一位同事杨风仪一家四口也请了去。这样，请来的客人就多达九口了。他本来就不富裕，住房也不宽展，一下增加九口人，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几天后，我们深感过意不去，提出要各回各家。他一再挽留，十分恳切地说：“目前社会秩序不正常，最关键的是你们的安全。其他问题希望你们不必考虑。只有你们留住在这里，我才能放心干革命”。就这样过了一个月，我们才陆续返回自己家中。

在暂住阿巴索夫家里这段不寻常的日子里，我们看见他的工作时间非常紧张，他每天只在晚上回家一次，与我们及家人叙谈一两小时，饭后即匆匆离去。那时，他仅二十四岁。尽管他很年轻，但我发现他读过的书很多，其中有些是那时很不容易弄到手的。如《联共党史》、《列宁主义问题》、《政治经济学》、《新哲学》等等。从他的言谈中看出，这些书籍他都读得精熟。所以，他的理想远大，头脑清醒，使我这个奋进半生、一事无成的中年人深深感到惊奇和钦佩。

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夏，三区革命获得初步胜利时，阿巴索夫曾担任伊犁临时政府公安部长、内政部长等职务。这期间，经他营救或保护的汉族一般群众很多，难计其数。解放后曾任新疆大学教务长的文斐然同志（当时任伪专员公署科长），当时被关进了集中营，就是阿巴索夫同志发现后命令释放的。

阿巴索夫在革命青年中威信很高。他非常重视对各族革命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的教育。一九四五年夏初的一天，他对我述说了他向青年讲话的情景。他对青年们说：“汉族在伊犁地区是少数，但在全国是绝大多数。中国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全国各族人民政治上的解放，只有各民族团结起来，革命的目的才能达到。要看到全国的革命，要看到各民族的解放，不要只看到伊犁目前的胜利。”他批评了有人主张把伊宁的汉族群众送到新源县集中管理。他说：“这个提议我是坚决反对的，它除了给革命带来损失以外，不会有任何好处。”他还建议要用团结十四个民族的口号，不能把汉族排除在外。他的讲话受到许多青年的支持。当时，他不仅重视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工作，而且采取具体措施，增强民族团结。经他建议，在伊犁成立了汉族办事处，作为汉族人民与政府联系的桥梁，反映他们的切身利益。此外，还出版了汉文报（三日刊），开办了汉族小学校。因此，汉族人民的生活安定，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他们热诚拥护革命政府。

一九四五年夏，三区革命军巧越冰达坂奇袭黑英山，进而包围了阿克苏。国民党守军据城死守，一时难克。阿巴索夫为了分化瓦解国民党守军内部，曾写信给阿克苏专员乔根（原任过伊犁专员）恳切地说明革命宗旨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各个民族（包括汉族）都应当团结起来，投入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去。这件事虽未成功，但阿巴索夫同志包括争取民族团结和统一战线的革命口号深入人心。阿巴索夫等三区革命的一些领导人还同乌鲁木齐各族青年的地下革命组织保持了广泛的联系，做了许多互助团结的工作。因此，当联合政府夭折后，一九四七年八月三区革命参加联合政府的人员限期撤回伊宁时，汉族中的一批革命青年

的领导人，如罗志、陈锡华、李泰玉、范印中等都随往三区，参加到公开的武装斗争的革命行列中去，壮大了革命力量。

一九四九年九月，阿巴索夫与三区革命的其他领导志同一道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共同协商建国大计之际，在乘机的途中，不料因飞机遇难壮烈牺牲，年仅二十八岁。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但阿巴索夫的光辉形象，总是不时的在我脑海中闪耀。他那年轻而又伟大的一生；他关心革命事业和爱护汉族同志的精神；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处理民族团结的共产主义思想；他用极力保护我们一家生命安全的高恩厚德，不仅我们现在记忆犹新，而且我的子孙后代永远记在心田。我们要世代代搞好民族团结，为把新疆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基地而奋斗。

忆我和阿巴索夫相处的日子里

崔景富

阿巴索夫于青少年时期就勤奋上进，学习努力。一九三六年他从喀什来到乌鲁木齐，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第一中学（即现在的一中）。我们相识就是从那年开始的，我们是同年级的学生，他是维文班，我是汉文班，朝夕相处的学校生活把我们紧紧连结在一起了。

阿巴索夫天资聪慧，学习认真，事事助人为乐，处处待人诚恳。他平时很喜欢与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同学接近，与各族青年关系亲密，团结搞得很好。当时，正是共产党员王寿成（俞秀松）任新疆学院院长兼一中校长，开始传播马列主义新思想的时期，因此，阿巴索夫一入校就接受了革命的道理与进步的思想。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阿巴索夫等同学都积极加入了“反帝会”，开展抗日救亡爱国活动。从此，他与汉族同学接触更多，进一步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一九三八年春，一中校长李志梁（李云扬、中共党员）、新疆学院院长孟一鸣（中共党员）、教务长林基路（中共党员）等同志上任后，他们的共产主义进步思想进一步影响着阿巴索夫。特别是当我们初中毕业升入新疆学院附属高中班之后（新疆学院院长由爱国主义者杜重远先生担任，教务长由共产党员郭慎先担任），在浓厚的进步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下，阿巴索夫从初步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到逐步走向学习马列主义时期，他在各门学业和思想方面都进步很快，可算得上是一名全面发展的好学生。

阿巴索夫由于学习态度端正，有立志为祖国而献身的抱负，所以，他不仅维文学习成绩优良，而且学习汉语文也很认真、刻苦。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他能用汉语流利地对话，能写畅通的汉文文章。当时我们都很佩服他，称赞他是一位了不起的青年。除此之外，他还学习俄语，掌握了大量词汇和一般文法，并能用以会话。

阿巴索夫还是学校的一名文体爱好者。他很喜欢抗战歌曲，积极参加学校的演唱活动。他最喜欢唱的歌有：《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以及由李志梁校长亲自教唱的《流亡三

部曲)等。一九三九年秋季,学校领导上选我和阿巴索夫利用课外时间,每周一、三、五去军校教唱《游击队歌》,受到欢迎。他是学校排球队的主力队员,也是青年篮球队的队员。他身高虽然仅有一米六,但弹跳力过人,扣杀力很强。篮球、排球队员有阿巴索夫、韩世义、王立才、康铁增、肖如宾、阎学甫、韩绍忠、罗志、乔国仁、艾斯海提、高昌言,阿不都拉木、陈锡华、禹占林、吴任文、周秉剑、皮锡忠等同学,可以说是一个各民族大团结的球队。阿巴索夫每次参加比赛,都非常注意球风,重视团结,通过比赛增强团结友谊。

阿巴索夫在学校里是各民族同学之间友好团结的模范。他不仅与同年级的同学友好相处,而且善于联系和团结高年级或低年级的同学,广交朋友。不仅维吾尔族的哈力克·沙得洛夫是他的好朋友;而且锡伯族的赵得林、佟金昌同学也是他的好朋友;同时汉族的陈锡华、杜恩贤、皮锡忠及回族的禹占林等同学都是他的知心朋友。

阿巴索夫不仅自己十分注意团结问题,而且还注意影响和帮助其他同学也搞好民族团结。有一次在省一中组织篮球友谊赛,正在比赛紧张时刻,汉族同学阎学甫与维吾尔族同学阿不都拉木(这两位同学都是学校代表队的主力队员)由于争夺一个险球发生口角,以至动起手来,使阿不都拉木同学鼻孔流血,影响很不好。阿不都拉木扬言也要把阎学甫打个头破血流。阿巴索夫闻讯后,十分关心这件事,他知道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影响学校内的民族团结,而且还会影响到社会上的民族团结。为此,阿巴索夫一方面向这位民族同学作思想工作,另一方面找阎学甫交谈,说明民族团结的重要。他说:“民族团结是我们学校的命根子,是事业的命根子”。经过他开导说服,阎学甫主动向阿不都拉木赔礼道歉,两人握手言欢,使各民族同学都受到感动,圆满地解决了这个同学之间的问题。

阿巴索夫在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下,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能够正确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他在短短的革命一生中,总是把民族斗争和革命斗争正确地结合起来,他特别重视民、汉族之间的友谊与团结。在盛世才撕去“进步”伪装以后,大批进步者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捕杀与迫害,他们的家属以“叛逆家属”的罪名,被流放到乌鲁木齐以外地区。阿巴索夫就是在这个时期因父亲被捕受到株连被送到了沙湾县当小学教师并限制了自由。一九四二年又被流放到伊犁。当时我去伊犁省亲,在伊犁中学的体育场遇到了阿巴索夫,他非常亲切地同我叙述了同学时期的友情,他还直爽诚恳地对我说:“崔景富同学,你是巴依的巴郎(意思是有钱人的儿子),今后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不能看不起穷人,而且还应当尽力帮助别人,帮助集体,这样咱们才是永远的好同学、好朋友,……。”他出自肺腑的谈话,使我深受启发与教育。以后我曾捐款资助同学解决困难,就是受了阿巴索夫的影响。

一九四四年三区革命爆发后,阿巴索夫是组织者与领导人之一,他也是积极主动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的发起人。三区革命初期,由于情况复杂,有些人冲进了伊宁沙河子中学(我妻子当时在该校任教),不分青红皂白枪杀汉族教师。阿巴索夫知道后,火速赶到现场。他知道这些教师多系省一中和新疆学院的进步青年被分到这里工作的,一定要营救他们。他机智勇敢地采取了将计就计的办法,以领导者的身份大声命令说:“这些人是重要的政治犯,一个也不许杀,给我统统捆起来带回去审讯”。谁能想到,正是这位民族英雄为了应付当时的复杂局面而采取的保护汉族同志的妙计。这些人被带走后,很快转移到伊犁汉人街去了(当时在汉人街呆下的人一律不杀害),就这样,他巧妙地保护了汉族同志免遭杀害。其中安铸清、田毓林、曹彩新等同学一九四六年到乌鲁木齐与蔡济民见面时,激动地谈了这一真实情

况，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阿巴索夫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政府代表与三区革命代表谈判达成协议后，阿巴索夫任新疆省政府副秘书长。同年九月的一天中午，阿巴索夫乘坐着一辆两套马的大皮包车来到我家找我。我父亲很恭敬地请阿巴索夫和同来的一位民族同志（名字记不清了）进了客房。当时我因在狱中患神经性头痛，出狱后正在家养病。寒暄了几句之后，阿巴索夫亲切和蔼地说：“老同学，身体怎么样？还是从事你的教学工作吧？（我是在省立师范任教时入狱的）你如果愿意干，我可以写封信把你介绍给教育厅长赛福鼎。”我正在考虑如何回答时，我父亲抢先说：“谢谢秘书长的关心，现在他身体不好，我们商量商量……。”阿巴索夫非常客气地说：“那好吧，你们决定之后，可随时来找我。再见，崔会长。”（我父亲当时是新疆省商会会长）。同样，蔡济民同学在困难之际，阿巴索夫也关心给他写过找赛福鼎安排工作的信件（此信至今蔡济民还保存着）。

一九四六年底，阿巴索夫去南京参加伪国民代表大会时，冒着极大风险到梅园新村找董必武同志联系汇报与请示工作。一九四九年九月，阿巴索夫与阿合买提江、罗志等同志乘机去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途中不幸遇难，年仅二十八岁。三十余年来，每当我回忆起这位民族英雄的光辉事迹时，总是深受感动，心情难以平静。一九八三年十月五日我在自治区政协会议室会见了阿巴索夫同志的唯一女儿哈吉亚，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崔伯伯，您好”。当时我心潮澎湃，为她已经成长为革命的接班人感到无比喜悦，我不由自主地记起了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同志的话：“新疆维吾尔族有一个很好的同志，名字叫阿巴索夫。……阿巴索夫是三区革命领导人之一。阿巴索夫完全是在我们党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在少数民族中，他是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团结以及与我们党的关系方面，表现最好的一位同志。新疆少数民族英雄人物，阿巴索夫是最好的一位。……。”这是党和各族人民对阿巴索夫的正确评价，阿巴索夫是受之无愧的。

徐学功二三事

金国珍

徐学功，乌鲁木齐南山人，汉族。幼习武功，勇力过人，善使长矛，能敌十数人，精于骑射，待人和霭，机智勇敢，通晓蒙、维语言。

在清同治二年（1863年）时，妥明（又名妥得璜，回族，甘肃河州人、阿訇）占据了乌鲁木齐与附近昌吉、玛纳斯、阜康等县。自称为皇上，修建了皇宫。他称皇帝之始，即与其部下大肆屠杀非伊斯兰教民众，并抢掠财物。乌鲁木齐、昌吉等地民众为了生存，即携带牲畜、财物与家属逃往南山避难。陆续到达南山的不下数千之众。当时南山的徐学功同其师傅吕六爷、董某（董荣之父）、薛某四人，都是有武功的人，而且是南山首户。为了保护逃来的数

千难民的生命财产，即挑选了强壮者四、五百人，组织起来，加以训练，以抵御妥明的抢掠屠杀。以吕六爷为兵团团长，徐学功为副团长（旋吕六爷战亡，徐即为团长），董、薛为队长，各率百余人，分驻于大、小东沟、板房沟、永丰渠、硫磺沟等处，设卡放哨侦查敌情。还将部分老弱与妇女派往山中放牧，部分人耕种生产，以充裕食需。

徐学功等为了巩固其防御，便联络焉耆山中蒙部，订了互助信条，还将蒙族猎人二十余人邀来参加兵团，又由山中小道与玛纳斯赵兴体、乌苏李志两兵团联络，互相支援。

南山徐学功兵团在这样的组织训练与设防下，迭次击败了妥明派来掠夺牲畜、粮食、财物之匪部及以后阿古柏匪军。

阿古柏系安集延军官，他先率军侵占我南疆喀什（当时均称他们为安子占），后即陆续攻占了南疆各区县自称为王。最后又攻占了吐鲁番。在当时适逢由甘肃逃来的白产虎部也投降了阿古柏，于是即合攻乌鲁木齐，击败了妥军，妥明投降。阿古柏侵略匪军即占据了乌鲁木齐。

阿古柏军队侵占了乌鲁木齐之后，南山的徐学功兵团，因其熟悉由南山至达板城、芨芨槽子一带的山径小道，即经常率轻骑于芨芨槽子、羊肠子沟、柴窝堡一带设伏，胜利地截击阿古柏匪军由吐鲁番运往乌鲁木齐的粮食和军用物品，使阿匪军受到很大伤亡与损失。

妥明投降阿古柏之后，阿将其所掠夺的财物金银全部夺去，其部下则更是对民众横征暴敛，并四出抢掠，遂引起回军和回民的愤恨。妥明即密派其亲信至南山与徐学功言和，并约好里外夹击阿古柏匪军的时间与计划。于是徐学功率队于斯日（1871年6月间）潜至乌鲁木齐，内外夹击，大败阿古柏匪军，并杀死了伪伯克马仲。阿古柏逃往吐鲁番。妥明再度当了皇帝。不久阿古柏又率大批匪军攻占了乌鲁木齐，妥明逃往玛纳斯，后死于该县。

1872年2月间，徐学功又被回军邀约率队至乌鲁木齐击溃阿古柏匪军。徐学功并派一部兵团驻扎于古牧地作为犄角防范之军，以防御阿古柏匪军。后因恐引起回、汉军队间的冲突，有伤团结，又令兵团返回南山。年余后，阿古柏侵略匪军又攻占了乌鲁木齐。

徐学功兵团不断的在芨芨槽子沿途一带设伏袭击阿匪的运输车队与配合妥明军队两次击溃阿古柏侵略军，徐的英勇善战的英名，轰动一时。

1872年春夏之交，徐学功得到玛纳斯、乌苏兵团的邀请，率队由山道抵达玛纳斯，配合两兵团的民兵，在赴奎屯的沿途设伏，截击了沙俄商队（该队是沙俄派至新疆私自测绘、盗窃文物的强盗特务）与阿古柏的匪徒等，共计打死了匪徒五十余众，获得枪械、马匹与物资不少。

1876年，清政府派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时，徐学功即在刘锦棠的领导下，率领着兵团作向导，击溃阿古柏匪军收复了乌鲁木齐和昌吉、玛纳斯等县，平定了西路匪乱，受到清政府的嘉奖，使其驻防昌吉为统领。其子为游击驻防古牧地。徐将其家属由南山搬至昌吉，后病卒于任内，年仅五十余岁。

国民党时期新疆田粮处派系斗争见闻

欧阳文麟

一九四四年蒋介石和盛世才多次讨价还价，最后以保证盛氏的官位和财产为条件，才算拍板成交，盛氏被迫离开新疆。蒋介石任命朱绍良为西北行辕司令长官兼任新疆省主席，接管全疆军政大权。以后又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充任新疆省主席。朱、吴二人都是国民党的元老，虽都是七十岁以上的高龄，但他们之间的斗争反映在军政之间，斗争激烈，各霸一方。为和缓矛盾，蒋介石另派余达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周旋于二人之间，但明争暗斗迄无宁日。吴忠信的省政府班子，是蒙藏委员会和CC的争夺场所。民政厅的邓翔海，财政厅的芦郁文，教育厅的许莲溪，建设厅的余凌云都是CC的大将。吴忠信的蒙藏委员会班底只安置了一个秘书长曾少鲁。CC把持的四厅又各立门户，争夺权势，内讧不已，直到吴忠信调离新疆。

朱绍良、吴忠信先后调离新疆以后，蒋介石派张治中将军接充西北行辕主任，统管西北五省。以后调宋希濂任行辕办公厅主任兼新疆警备总司令；刘孟纯任行辕秘书长兼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宋、刘二人代张分掌军政大权。但刘孟纯仅系张的幕僚长，自然不能与蒋介石的宠将少壮实力派宋希濂相抗衡。在财源、人事等方面，仍相互齟齬不已。

新疆田赋粮食管理处（简称田粮处），系中央粮食部的直属机构。因地处边远，情况特殊，无力兼顾，在人事和业务上均由新疆主政当局就近节制管理，系双重领导系统。该处于一九四五年七月组建，由财政厅长芦郁文兼任处长，张宏与、章裕充任副处长。这二人都是盛世才时期的留用人员。张治中主新后，芦郁文坚决辞职离去，所遗田粮处长职即派章裕补充。章裕没有人事关系，便竭力倒向刘孟纯为靠山。因业务及利害关系和警备总部节制的联勤总部驻新疆供应局对立尖锐，引起宋希濂极度不满，必欲去之而后快。

一九四六年新疆粮食歉收，军公粮食供应紧张，除千方百计把南疆粮食北调乌鲁木齐补给外，仍有重大差距。章裕向刘孟纯秘书长提出到甘肃购运五万市石解决新疆供粮问题的建议方案。章裕认为：由甘肃购运粮食虽运距较长，但商人汽车多，汽油充足（有玉门油矿），油价较低，总的计算，运费仍较南粮北调为低。这个方案在新疆军政当局通过后报粮食部批准，并因当时甘肃省政府主席系行辕付主任郭寄嶠兼任，也取得了郭的支持。一九四七年二月章裕偕同储运处长欧阳文麟及有关工作人员到兰州洽办采购及运输工作。

由于行辕陶峙岳、郭寄嶠两副主任的大力支持，采运工作进展顺利，于同年十一月即进入收尾工作，缓和了新疆粮食的紧张局面。但因宋、刘摩擦的关系，章裕既归顺刘孟纯，不愿效忠总司令部。宋便乘军粮供应紧张的关头以章裕工作不力，才不堪用为由，用张治中的名义，电粮食部撤换章裕，推荐新疆供应局副局长李甲三接充。这一未与刘孟纯协商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使刘来不及控制便由粮食部批准。于是李甲三积极准备班子接管。消息

传到兰州，章裕颇为焦虑，立即返回新疆，筹谋对策。第三天晚上他用长途电话召我回新共商挽回局面，我探亲回兰州，席不暇暖即行返回乌市。当时了解到李甲三接手已成事实。共同研究：只有仍然通过刘秘书长，才能转败为胜。于是我们分头活动，向刘左右实力人物谭维熙、刘毅、林荣玖等人说项，告以利害关系，并表示继续效忠秘书长的诚意，请他们促使秘书长大力挽回粮食部成命。这一策略果然取得了成效。刘同样以张治中的名义电粮食部，力保章裕。电称章裕今年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建议甘粮西调。并亲到甘肃办理采运，缓和了供应，工作勤奋，才堪胜任。李甲三系军人，不谙地方情况，毋需更动，请粮食部收回对李甲三的任命，仍由章裕继续担任原职。粮食部深悉一由“办”字发文，一由“秘”字发文的来由，不愿表态，乐得顺水推舟，又同意了刘孟纯的请求，撤回对李甲三的任命。

李甲三的接替班子正在兴高彩烈地准备走马上任的时候，粮食部留任章裕的电令到达，李甲三等大感扫兴，而章裕的班子则精神大振。刚愎自用的宋希濂对此岂能容忍，便伺机报复。恰好年终田粮处、供应局要会同研究下年度粮食供应计划，照例由总部召集。宋便以总部名义召集两单位负责人在总部会商，准备在会议上拿章裕开刀。章裕听到风声，颇费踌躇，对我说明他的耽心，让我代他出席会议。我分析了宋的个性和作风，决定采取回击的强硬态度去参加会议。与会者到齐后，宋步入会场，气氛严肃，扫视一周便问：“章处长为什么没有来？”我回答：“章处长今天主持一个重要的会议，让我代表他来参加。”宋说：“你是什么人？这样重要的会议，你能负责吗？”我说：“我叫欧阳文麟，田粮处副处长兼储运处长，我既来开会，自然全权负责。”宋哼了一声，接着在说明会议的内容和要解决的问题之后，话题一转，发作起来，斥责说：你们田粮处的工作很不负责任，现在已到年终，还拖欠本年度不少军粮未拨。贻误军粮，你们是要负责任的。他说完一拍桌子，怒容满面，显出“山雨欲来”的态势。但我看出来的“欲加之罪”的泛泛指责，说明他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只是凭供应局一面之辞的材料而发火的。随后我便答辩说：“我们欠了哪个地区的军粮还未拨付？请总座具体指示？”宋便把供应局提供的资料在桌上推出，并指出具体拖欠数。同时，我也打开公文夹拿出本年度拨付供应局的表报回答说：“根据总座的指责，说明还不甚了解下情。田粮处的供应职责必须根据每年南北疆收入的粮食来源，会同供应局拟定的全年军粮供应计划，尔后呈由行辕核定报请粮食部、联勤总部批准后，双方才能按批示执行。新疆粮食供应特点是北疆粮源少而供应量大。田粮处的原则是尽量把北疆的田赋和采购粮的收入拨供军粮，以减轻军方运输负担。今年粮食欠收，以甘肃粮食西运补给，仍按军粮第一原则，今年应在北疆拨付的已基本拨完。不足粮源由南疆运到库车、轮台、焉耆三点，交供应局接运，这是双方每年共同执行的供应方案。今年南疆集中运输的粮食任务业已完成，全部入仓。至于供应局能否及时接运，这就不是田粮处的责任了，请总座三思。这里有拨粮报表，请总座过目，我认为总座的指责，很难接受。”我把报表送到他的面前。宋浏览一过未再表态，会议开始讨论下年度的计划。这场“渥池之会”的风险总算躲过。消除了章裕的耽忧，稳住了田粮处的阵脚，这也是我和宋先生的第一次周旋。田粮处的争夺，也反映出国民党时期新疆统治政权内部派系斗争的一个侧面。

诗 词 十 八 首

欧阳克焱

舒春光先生以所作《高原牧歌图》见赠，谨以俚句奉答。

融会南宗与北宗，
先生妙笔夺天工。
还将骏骨酬知己，
万壑清冷仰古风。

为破晓先生作书

书道吾无分，
堪称是野狐。
感知聊一试，
弄翰趁三徐。
心正犹能信，
名卑未必孤。
愿君多采掇，
沧海有遗珠。

秋 雨

秋雨催凉意，
开窗一展胸。
繁花新润色，
老树暗移容。
弃扇窥人事，
观茶验世风。
莫惊时节改，
努力蹑离踪。

读黄文弼先生《西北史地论丛》

考古西陲路屡更，
闾幽索隐慰平生。
千秋艳说西王母，
到底穷山出玉英。

（先生有《古西王母国考》）

盐泽千年几度清，
一时戈壁水盈盈。
老天似有怜才意，
故创奇观播令名。

（先生曾亲见罗布泊北部积水，一时传布中外）

读《后汉书·马援传》

据鞍顾盼气何雄，
薏苡明珠德不终。
鱼水君臣能有几，
空教儿辈慎持躬。

纪念柳亚子先生逝世

二十五周年

南社诗词谱正声，
挥毫念念为苍生。
江山代有才人出，